

问题出在“财政返还”上

当“量化罚款”遇上自媒体时代 6月6日 广州日报 王琳

广州日报一评

6月3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则贴在陕西省西安市未央交警大队里的通知,引来众多网友围观。通知中称,由于该交警大队在4月份人均纠违只有163例,为全支队最少,已经被通报,希望民警们“加大照相机抓拍和开具通知书力度”。

(6月5日《华商报》)

有位微博网友的质疑颇具代表性:把交通管理当企业经营,考核以罚款为指标,还做横向评比,末位点名。这种机制下的导向只有一个结果:罚款、罚款、再罚款!

罚款指标催生“执罚经济”,这是必然。交管部门也好,其他执法部门也好,都是法律上拟制的“被授权之人”。公民通过立法授予这些执法部门在公共事务管理上的权限,意在使这些权限能够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全民福祉。

交警有权依法执罚,这里的“罚”既是指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又是一种预防措施。“罚”本身不是利益,因为罚款要上交国库。但“财政返还”又使得罚款客观上成为部门利益的一部分。一些执法部门有意让“执罚”走偏,正是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

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6条才会明文规定:“任何单位不得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款指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以罚款数额作为考核交通警察的标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向上级机关报告。”为严禁“屡禁不止”的罚款指标,公安部还曾在2003年8月专门发出通知,凡有违者“一律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

从公安部措词的强烈,不难看出这一问题积重难返。在一些地方,陷阱取证,只罚不管,交通标志不明,道路规划不科学等,已然成为公众领取罚单的源头。

一来一往之间,民怨积聚,一有发泄的出口就迅速以网络舆情的方式爆发出来。这次的网民围观,同样是基于公众对“执罚经济”由来已久的不满。

现代快报再评

西安市未央交警大队的事儿,无论怎样解释,网友都心知肚明了。这事让我想起几年前的经历,某个黄金周开车到粤北旅游,回深圳就收到某市交警的罚款通知书,白纸黑字盖公章,一看就头大,也就打算冷处理。过了几天,看到媒体报道该市设陷阱,不少深圳车主交完罚款回来,再收到罚款通知,方知原来这是人家的“买路费”。再查省里的交通违法记录,嘿嘿,根本就没俺那车。这事说明,一、俺没违法;二、人家收的那罚款,压根没打算交国库。

现在执法程序更透明了,违章处罚讲证据,还可申诉,平白无故收“买路费”操作难度大了。可“罚款指标”或明或暗还存在。问题就出在“财政返还”上,返还按比例,罚款有提成,交通管理成了一门无本生意,自然扭曲公共政策的目标指向。

是服务生育还是服务公章

根据政策,夫妻双方皆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但必须事先申请。怀孕一个月的王梅没想到过程颇费周折,全家人一起行动,前后花半年时间盖30多个章才拿到《生育服务证》。

(6月7日《新民晚报》)

生二胎要30个章岂一“烦”字了得 6月8日 广州日报 黄小琴

广州日报一评

一个证、半年时间、30多个公章,岂一个“烦”字了得!人口迁移愈发频繁,人户分离越来越多。但按现规定,办理生育证,须回户籍所在地这种硬性规定使得异地办证更加困难。而花半年时间盖30多个章的咄咄怪事,从侧面暴露出以公章为表征的权力意识遍及各行各业,令人深思。

公章代表的是一个部门的权威和公信力,可如今却有人把它当成敛财的工具。其实,在二胎证领取上设置那么多盖章环节,恐怕并不是办事必需,而是不愿放弃通过盖章体现出的权力和其中带来的实惠。或者说,是对公章的迷信与崇拜,使有关部门丧失了主动判断简单事实的能力,也让“盖章费”有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笔者并非要求取消盖章,而是希望简化办事程序和程序,不要把领取二胎证设置得那么繁琐。政府相关部门要真正做到“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尽量突破各种条条框框,将相关手续更人性化、科学化,让办事群众能够省心、顺心。一些职能部门只坐在办公室盖公章,不迈开双腿下基层访社区,这是“懒政”,但“小政府大社会”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压缩审批时限。千万不能让领二胎证盖30多个公章的事再发生了!

现代快报再评

《生育服务证》上有“服务”两字,顾名思义,是为生育服务,让人感受到公共服务的温暖。可孕妇王梅全家出动,前后花半年时间盖30多个章,才拿到这一纸证书,那就不只是一个“烦”字,还有“汗”字,还有“寒”字。这哪是为生育服务?摆明了是让孕妇为公章服务。看来,这年月的文字,尤其是公共生活中的文字,大多靠不住。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不管以什么理由,首先应尊重公民的生育权。设置30多个公章卡住“非计划”的生育,说到底是不信公民信公章,宁愿给百姓增添这么多麻烦,而不愿自己简化程序,最大程度为当事人提供便利,方便自己、麻烦公众,这是颠倒错乱的行政理念。

“躺着中枪”也要“站着回应”

网上删掉副市长,机构就消肿了吗 6月7日 新京报 燕农

新京报一评

近日,安徽芜湖市副市长詹云超因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学,受到舆论热捧。但随后有记者发现,380余万人口的芜湖市竟然配备了11名副市长,大大超出一般职数,甚至比省会合肥市都多。受到质疑后,芜湖市政府网站更改了有关副市长的名单,将其中三人的名字删掉。

(6月6日人民网)

网站上的副市长数量看起来是少了,但现实中的副市长,是否也被裁撤了呢?

多配副市长,就意味着多配工作人员、车辆、办公资源,并且还会增加公务消耗。

这笔账显然要比骑车送孩子上学所“节省”的部分重得多。虽然账不能算到某一位具体的副市长身上,但舆论此刻的纠结至少说明:在信息不全面、职位设置不科学的情况下,即便是亲民节俭的副市长,也是会被“误伤”的。

面对公众批评,芜湖市从网站上删掉了3名副市长,显然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配置存在问题,但到底是仅仅停留在“网上平账”,还是准备在实际中做职位调整?或者说是已

经减少了职位,仅仅是网站忘记了更新?公众现在无从得知。

显然,当地需要在直面事实基础上,用完整的信息来消弭质疑、平息风波。

如果不是正常调动或者免职,至少被删掉名字的几位副市长在现实中还是副市长,那也就是说,财政支出不会减少。

正因为公众算清了多一位副市长的诸般开销,要远高于骑车送孩子的“节省”,舆论才会反转。

一个职数配备臃肿的政府部门,其中人员即使再节省也不过是个人操守问题,而整个部门的浪费则是制度问题。

所以,平息风波,需要芜湖方面回到信息公开和遵从制度规划的路径上来,单靠表面“平账”很难被公众“买账”。

现代快报再评

芜湖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孔令才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澄清,该市严格按照“一正五副”的标准配备干部,11名副市长中有1位已辞去副市长职务,有5位是挂职,该市并没有出现超标现象。现在看来,是媒体的报道有误,让芜湖市“躺着中枪”。

“躺着中枪”也要“站着回应”。所谓“站着回应”,像新闻办主任这样讲事实摆道理的回应是其一,管好官方网站是其二。官网也是回应公众关切的重要方式,如果更新不及时,不细致,很容易引发媒体及公众的“误读”。此事对政府部门和媒体都是个教训,政府部门稍一偷懒,就引来公众猜疑;媒体在报道时缺乏细致调查,仅凭孤证就下结论,未免太草率,损害自身的公信力。

“误国误民说”不值一驳

经济学家“误民说”,谁来反驳? 6月7日 广州日报 朱四倍

广州日报一评

自称“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邹恒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口出“狂言”,指责国内经济学界水平低下、信口开河,某些人不务正业,“有些经济学家捞钱误国误民”。

(6月6日《广州日报》)

必须明确,经济学家是一种职业,而不是独处神坛的人士,也有私心,通过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观察,可以说,所谓利益集团的御用专家等判断并非虚言,正是在这点上,几成贬义色彩的“经济学家”成了被“攻击”的对象,而被“攻击者”也甘当沉默的羔羊。

曾经有主流经济学家声称,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学家是“道德中性的”,“或者是不讲道德的”。根据这样的逻辑,经济学家容易以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甚至为公共利益代言,以致有人说:有人站出来为公共利益说话的时候,千万要当心。

“有些经济学家捞钱误国误民”的判断如果属实,无疑是对公平正义的伤害,更有可能带来对弱者的侵害和社会的割裂。这是我们必须

警惕的。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缪达尔曾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应当满怀人类的同情心,献身于这样一个信条: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毫无疑问,社会需要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问题发表专业性意见。但在发表意见时,不能掩盖真相,不能仅仅为利益集团代言。要知道,公众如果一直不相信经济学家的话,将会降低社会的安全系数。道理很简单,公众和政府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因为经济学家的错误导向而产生危险的后果。

期待有经济学家能以足够的勇气来反驳“捞钱误国误民”说。经济学家“误民说”,谁来反驳?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问题。

现代快报再评

经济学经世济民,经济学家却精于计算。邹恒甫“狂人狂语”,看似

出位,其实也计算了成本与收益。他说国内经济学界水平低下,这与他郑重其事地自称“中国经济学第一人”一脉相承;而说“有些经济学家捞钱误国误民”,这是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一锅烩。经济学家捞钱,济民也济己,那就看取之有道或无道。为利益集团代言,钻了空子是空子的问题,没空子可钻硬钻的自有法律、规则伺候。

此外,他说的是“有些”不是“所有”,捞钱的不敢站出来取,没捞的不便站出来取,毕竟这世上没多少人有无畏的勇气敢自夸自己是“第一人”,邹恒甫看准了这一点,算盘打得门儿精。

再者,公共政策的制定,除了经济学,还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参与其中,还有政治家的决策和民众的智慧。仅凭那些“水平低下”的经济学家就能“误国误民”,那也太抬举了经济学。